

## 「余，台灣人也」——論連雅堂先生之鄉土認同

林玉体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連雅堂先生在台灣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他著作多，經歷也不少，一生中以兩大抱負作終身職志，也告誡家族及台灣人民，一是做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史，二是做為台灣人，不可不說台語。他的具體貢獻是出版《台灣通史》及《台灣語典》。另外難能可貴的就是他屢次重述且強調「余，台灣人也！」誓不作清國臣民及日本國民，充分表現出台灣人的義氣與志節。不過，連氏也參加過清帝所辦的科舉而落第；他的著作倒受日本朝野稱頌，更令人疑惑的是，在「國家認同」上，他晚年卻不願其子孫作個「台灣人」卻願作個「中國人」。因此當中國取代了日本來統治台灣時，他及他的後代都享盡榮華富貴。本文係依史料來剖析連氏「余，台灣人也」此句話之複雜意涵！

**關鍵詞：**國家認同 科舉 台灣通史 台灣語典

### 前言

連雅堂先生畢生著述的兩大領域——詩及史——中一再的表明他的「台灣民族意識」。「余，台灣人也」，這句話，出現的次數頗多。連雅堂一生，橫跨清國與日本國兩個「異族」；他出生時(1878)，台灣屬大清帝國所統治，他死時(1936)，台灣早歸日本國管轄。作為一個「台灣人」，他之不願「臣服」於「清」，乃因受到中國歷史上漢家正統觀念之影響。「稽古讀書，不應科試，蓋猶有左衽之痛也。故自興位公（連橫之始祖）以至我祖父，皆遺命以明服殮，故國之思想悠然遠矣。橫不肖，懼隕先王之懿德，以葆揚國光，以唯種性之昏庸是傲，緬懷高蹈，淑慎其身，以無慚於君子焉。」（註一）台灣人，是漢人之後裔，也是「明朝」之遺民，因此自認為明鄭延平郡王之一份子，是心甘也情願；但在「覺羅」族（即滿族）之下，則有「左衽」之痛。《台灣通史》之著作，首揭台灣是個「國」。

「台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註二）批評台灣之《舊誌》，不只「頗病其疏」、「文采不彰」，且「誤謬」甚大。尤其痛詆沒有站在台灣民族的立場，而誣指鄭成功為島夷海寇；朱一貴、林爽文為叛逆亂民。殊不知這些民族英雄是「孤忠高義」，是「草澤群雄」。（註三）連橫之作為史學研究者，除了「史實」之搜集外，更發揮他的「史觀」。至於他之反對日人殖民，更是當時台灣士紳之共通意旨。對於一些著和服，採東夷驚舌之音，為虎作倀者，則指斥為「大盜竊國」、「民彝蕩盡」、「恬不知恥」。換句話說，在連橫的心目中，他只願作個「台灣人」，不願是個「清國人」或「日本人」。這種記述或苦衷，在《連雅堂先生全集》裡，俯拾即是，不必贅言。

## 本論

根據連橫的一生及其言論，雅堂先生之「台灣認同」，筆者擬提出下述數種評論：

一、基於「台灣民族」大義，「義不帝秦」。連氏祖先留下遺訓，連氏一家，永不受祿於大清。「覺羅氏以東胡之族，入主中國，建號曰清；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視如犬豕。」（註四）除了作「招俠」詩以自勉：「吾生愛大俠，慷慨報國仇，國仇今未報，男兒死不休，荆軻挾匕首，隻身虎狼投……願君學大俠，慷慨報國仇。」外，另研究「台語」之「清生」為「畜生」，比喻清國人如同「犬豕」。（註五）謹記故老之言：「清人入關時，明之遺臣與約三事，則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官降吏不降也。台為延平肇造，又多忠義之後，故抱左衽之痛。我家居此二百數十年矣。自我始祖興位公以至我祖，皆遺命以明服殮。堂中畫像，方中寬衣，威儀穆棣；故國之思，悠然遠矣。」（註六）此種抱負，使連橫這一個讀書人之「士」終生抱著不「仕」念頭，尤其是清國之「仕」。「守樸抱貞，代有潛德，稽古讀書，不應科試。」「連子少主報政，論大事，幾二十載，獨介然不為功名富貴動其心，雖歷試諸艱，不挫所守，嗚呼賢哉！」（註七）視清國之滅明如「國仇」！並熟背「春秋之義，九世猶仇；楚國之殘，三戶可復。」的連橫，晚年（1993時氏為56歲）內渡中國時為詩：「飲馬長城在此行，男兒端不為功名」。（註八）但「功名利祿」之事，卻似乎也動搖了連橫之宿志，年青時（1897時氏為20歲）赴上海聖約翰攻俄文。在台詩友相送，詢以「問君何事客他鄉，答為功名去梓桑」。（註九）更在25歲時（1902）去廈門捐監應試，也至福州參加鄉試。由於「先生有過激語，干時忌，考官批曰荒唐，不第。」（註十）

以清國為不共戴天之國，目覺羅族為「異族」，連橫「幸」不在「左衽」之境過活，為何也有投效

之念？此種台灣鄉土之認同，不無令人起疑其堅定之心意。雅堂先生，史學家也，更是歷史教育家。如能以《台灣通史》及《台灣語典》等為一生志業，摒棄俗世引誘，埋首學術著作，發揚台灣文化，「青山青史」共葬於西湖，在「台灣民族大義」上更顯完美無瑕。科舉在中國士大夫中，絕少人能不為其所誘，只有能跳出時空框框者，才不會為其所「網羅」；連橫年少氣盛時有「暮登天子堂」念頭，似乎也不能衝破此千年窰梏。歷史人物理念之無法前後一致，難免為後人所詬病。如果連氏一試及第，或從此仕途一帆風順，則是否他還有「反清復明」的「台灣民族精神」，也在未定之天。連橫之認同台灣鄉土，是認同台灣人之歷史精神。清人編「台灣府誌」，誣讟台灣先民烈士，其目的在於消滅台灣人之台灣意識。「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烏乎！余聞之先哲矣，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敗人之綱紀……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台灣人知台灣史否？……吾思之，吾重思之，吾能不懼其消滅哉！」（註十一）連橫以著《台灣通史》而名傳千古；他若作個清朝小官，則在歷史洪流中，諒也只不過是「玉山之一雪，甲溪之一水」（註十二）而已；更易引來評論者之恥笑，殊為不值。

此種歷史「史實」，史例也不少。宗教改革健將高張反對大旗，原先羅馬教皇如接納他的建議，路德可能也不會流芳百世。孫中山或者也擬謀清朝一官半職，李鴻章如召見這位上書的青年人，則「中華民國國父」之名，或許落在別人頭上。還好連橫科試名落孫山，否則留長辮、侍清官。凡是稍有「台灣精神」者，當不屑為之。

二、日本佔領台灣之時，台灣人誓死反抗。「台灣民主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但卻也如曇

花一現。台灣寧可人人戰死而被佔，也不願拱手讓日人垂手可得。日本政府深悉台灣人此種台灣鄉土精神，遂與清國簽約，兩年之內台人不願作為日本國民者，日本政府保證安全讓他們離開。可能也是命運的安排，連橫之父卻於該年去逝，雅堂先生只好以十八歲之獨子，在台南故家守喪；沒有機會參加抗日行列，或登記離日回清國。否則他可能也與林崑岡一般的投筆從戎成為「台灣國」之烈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日人佔領台南後，「戎馬倥傯，四郊多警，縉紳避地，巷無居人」；並且把連家視為延平宿居的故里，「危牆畫棟，夷為平地。」雅堂先生遭失台、喪父、也毀家之橫變，遂「飄泊四方，不復有故里釣遊之樂」，乃「手寫少陵（杜甫）全集，始稍稍學詩，以述其家國淒涼之感。」（註十三）連氏此時心情，悲淒之切，外人當無法完全領會。

不過，雅堂先生猶如同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一般，先是死不接受日本統治台灣這個事實，但形勢比人強，其後也不得不默認，不只讀日語，且和文造詣甚高。（註十四）子女接受日式教育，獨子連震東還赴日本慶應大學深造。（註十五）《台灣通史》出版時（1921年），台灣朝野褒貶不一。台灣人批其抄內地圖書，阿諛日人，不通外語，史實不確；更有甚者，還有人說不是「通史」而是「通尿」。（註十六）倒是日本政界為文讚美，此或受美國總統於一次大戰後（1918年）宣佈民族自決之自由學風有關。「台灣通史之著作與出版，日本人方面當然心中不太十分甘心，然而也無可奈何。唯對於〈獨立紀〉這一標題，用政治壓力更改為〈過渡紀〉，但書邊緣上仍印的是〈獨立紀〉字樣。」（註十七）不過，總督府民政長日下村宏說：「氣象雄渾、筆刀適健，論斷古今，吾人不能測其才之所至，蓋近巨觀也。」（註十八）尾崎秀真為之序：「連子非官也，一介之史家也。」台南新報主筆西崎順太郎亦書：「畏友連君雅堂，台南文壇之翹楚也。……而史學尤極蘊奧，足備一家之見。此書刊行，不特足

資本島之文明，更足以貢獻帝國學界者不少。」

（註十九）總督府更以公款購數十部供機關學校參考。連橫一生，求職於清國，無官位於日本。「恥仕二姓的初衷」，「連氏世代奉為家規，迄於民國，皆遵行不誤。」（註二十）連氏家屬此種論斷，並不合乎史實。不過，連橫對於「異族」之日人不願意歸化，但日人尚以禮待之；而對於「異族」之滿人，在內心仇視的同時，還去應清國鄉試而為清朝所拒，且日後在福建辦報時，還大受清朝政府騷擾，甚而有被暗殺之虞。如果他秉承「余，台灣人也」，而不受「以管窺天，以蠶測海」之史觀所蒙蔽，為台灣人自成一民族，自立一國家的「命運」而奮鬥，相信他應該是別無選擇的。要是退而求其次，台灣人只能在日本人統治或清國統治這二者之間作一決定，則是否應以連氏所服膺的英國功利主義名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標竿（註二十一），以當時清國之敗象俱呈，比之於日人對他之以禮相待，在價值高下的取捨上，連氏當作明智的判斷吧！作為史學研究為職志的連橫，當知台灣人悲哀慘痛的歷史。

《台灣通史》既受日人青睞，設若連氏本其年青時擬赴清朝為官之心意，也向台灣總督府表態，或許早是個地方小吏。此時，連氏台灣人立場之排日及排滿情緒，是否有變，也是極為有趣的想像話題。日本政要題以「名山絕業」、「文獻可徵」，此種誇獎之詞，或可稍平日人毀台南馬兵營連氏舊古宅「古木鬱蒼，境絕清悶」之餘恨，並可藉機向日人「存正朔於滄溟，振天聲於大漢」。（註二十二）連氏著作，出版在日治時代的台灣，日本政府非但未予查禁連氏帶有強烈漢人正統的史書及史詩，反而群相附麗，比之於中國章太炎稍晚（1927）才為序曰：「台灣無德於清，而漢族不可或忘也。余始至台灣，求所謂遺民舊德者，千萬不可得一二。今觀雅堂先生之有作，庶幾其人歟！」（註二十三）不遑稍讓。連橫可能基於此種學術寬容之氣氛，在報刊雜誌發表宏論，為詩作詞譴責台灣總督府之倒行逆

施，企圖「思想善導」（註二十四）台灣人民時，但也曾為詩頌德兒王督憲南巡：

我公秉節蒞封疆 除殘伐暴登仁壽  
揚文開今集英才 策上治安相奔走  
王事鞅掌已靡遑 又舉南巡施高厚  
福星光照赤崁城 冠蓋趨蹌扶童叟（註二十五）

連氏始終不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為官，堅守「不仕二姓」的祖先遺命。但如果能拋棄「正統」想法，細心觀察任何統治台灣的政權，是荷蘭人、西班牙人、鄭氏、清國人、日本人、中國人、或台灣人，只要能「認同」台灣這片鄉土，共同承認「余，台灣人也！」為台灣人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則為文歌功頌德，又有何不可！如招來別人異樣眼光，視之為御用文人，則埋怨者可能只自限格局，真如夏蟲不足以語冰、鼠目寸耳而已。

三、「余，台灣人也！」雖然屢次出現，但卻也頻頻接著說：「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註二十六）連氏所稱的中國，並非覺羅族治下的大清帝國，而是漢民族正統的國家，因此基於「漢族」正義，排滿甚烈。民國成立之前，連氏曾到廈門辦報（福建日日新報），要驅逐韃虜，引來清廷飭吏向駐廈日本領事抗議，認定連氏是「日本籍民」。

（註二十七）其實連橫一心一意除了要作台灣人外，更要作中國人，他是不願入日籍的。他的台灣認同，是相對於日本人統治之下不願使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政治主張，「投鼠忌器」，「因知棄地遺民，別有難言之隱痛。」但仍在《台灣通史》風俗志序曰：「台灣之人，中國之人也」，此一句話，使中國政治界及懷抱「大中國」的學術界振奮不已。方豪就說：「此一語也，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通史問世……而每一讀此，如見其人，凜然如生而躍然紙上也。」（註二十八）這些大中國主義者故意忽視雅堂先生也說過：「台灣，海國也」，「台灣為南海之國」及「台灣者為農業之樂國；以其有贏，販運中國，遠至日本南洋。」等視台灣為「國」之名號。並且

「台灣」與「中國」、「日本」等國並列，「民殷國富，故能以彈丸之島，拮抗中原也。」（註二十九）

不過，連橫書中稱台灣為「國」，是否等於「台灣民主國」之獨立國，或甚至都擺脫一切宗主國之依屬，「永清」更無必要且與中國平行對等之國，則殊堪玩味。衡諸史籍，連橫並無台灣分離於中國之外而獨自成立為另外一國的心意，他倒希望台灣與中國統一合併，因此搏得中華民國黨政要員的歡心。連橫受到蔣介石之明令表揚，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舊新公園）「劍花亭」有雅堂先生銅像，不只國府感謝連氏「民族主義色彩濃厚之史書，內以喚起淪陷在日人統治下的全民懷念祖國，以免全民受日人統治一久，民族意識慢慢消逝，而致發生數典忘祖的情形……連雅堂氏，堪稱是熱愛祖國的大史學家。」（註三十）尤其當台灣人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不久立即發生全島性的反抗暴政慘變，「余，台灣人也！」激起獨立建國意識之際，搬出連橫不厭其煩的道出「台灣固中國版圖」，（註三十一）試圖壓服台灣獨立的聲浪。且自抗戰以來，對去世已久的學人，發佈總統褒揚令的，前有梁任公，後有連雅堂。（註三十二）台灣的連雅堂與中國的梁任公，在學術造詣上，國府認定可以併駕其驅，這是台灣人之光榮。其實，梁啟超是保皇黨，也供袁世凱玩弄，連橫曾為文批判。（註三十三）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梁啟超之政治理念，合乎當政者之企圖；連橫之國家認同，也與蔣介石等人同調。將連梁二人併列，實在十分有趣。1916年，時雅堂先生39歲，吟一詩痛罵袁世凱：

豈是唐虞禪 偏生莽卓臣  
黃花如可問 愁絕淚沾巾  
不惜民權貴 唯知帝制尊  
可憐華盛頓 竟作拿破崙  
國會遭摧折 邦基又覆翻  
共和才五載 興廢與誰論（註三十四）

「文人甘作賊」，這種評述，實是下了毒語。

但連氏死後如有知，台灣人若果受他中國情懷所左右，一心以作中國人為榮，認為回歸「中國」懷抱，是使「棄地遺民，亦沾雨露」，「國光遠被，惠及海隅」。(註三十五)且認定孫中山之三民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新思想，可以與威爾遜之民族自決，俄國之勞農專政，英國之同盟罷工，日耳曼之民治，愛爾蘭之獨立，甘地的消極抵抗等相比美。(註三十六)因此瘋狂的熱愛「祖國」，張燈結彩，放鞭炮，獻鮮花，購買孫文學說熱心研讀，練唱「國歌」，組織三民主義團……。這些二次大戰後台灣人民向蔣介石歡呼「萬歲」的場面，似乎也是連橫之所樂見。可惜他已在九泉之下，無法親睹這種歡樂景觀瞬即轉變而為台灣史上最慘酷的悲劇。梁啟超所鍾愛的皇制，不旋踵即崩潰；連橫所心儀的國民黨也在輾轉之間從中國消失，但卻在台灣荼毒不少雅堂先生所認為的「台灣人」，連氏死後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連橫不仕清、日，等到中華民國革命成功，他內心雀躍無比，以台灣遺民身份親祭延平郡王：「台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頓首載拜。……滿人猾夏，禹域淪亡，落日荒濤，哭望天末，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以與滿人拮抗。……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此雖革命諸士斷腕流血，前仆後繼，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靈，潛輔默相，故能振天聲於大漢也。……今者虜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維新，發皇踵歷，維王有靈，其左右之。」(註三十七)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台灣心，中國情，二者在比重上，有了巨大的改變。

1. 連橫很有計謀的把獨生子連震東，託由國民黨要員教導與提攜：先是致函張繼：「弟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人，是以託諸左右。昔子胥在吳，寄子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黃之華胄，而為他族之賤奴。」(註三十八)並要連震東努力學「國語」，視張如父，隨侍左右。更在家書上表明：「吾不欲汝為台灣人，尤不欲汝為一平凡之人。」(註三十九)「余，台灣人也！」

雅堂先生說此話時，語氣是多麼的驕傲；竟然不願其獨子步其後塵，且又以作台灣人為恥。此種心態之鉅變，值得吾人重視。

原來連橫在潛意識裡仍想償還家出仕入相宿願。試看連橫致長女之信：「汝弟此次出門，實為前途之計；邀天之福，如得機會，以圖寸進，則余三十年來之希望乃得償矣！」而前途之計，又是「遠大之計」。「京中近來如有考試，震東可準備投考……無論作行政官、外交官、財政官均可嘗試。」何況「中國甚大，到處可為」。「余亦欲汝報恩於中國也。」「我家積德累行二百餘年，滿清之時，伏而不出，及汝之身，必能大發達也。」「照像已到，汝母見之大喜，以汝已為中國人，而服中國衣冠，蓋以慰余之宿望也。」(註四十)相形之下，則「台灣實不可居，……余之文學如在台灣，已無用處，或能於中國，再作一番事業。」「此間青年毫無生氣，所謂大學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絕；其活動者，則呼群集黨，飲酒打牌跳舞而已；墮落如此，可憐可憫！」「台灣無事可為，居之甚厭！」「余居此間，視之甚厭。四百萬人之中，幾於無一可語，生計既絀，信義全無，可痛可憫。嗚呼！奴隸之子，永為奴隸！」「台灣無望，台之青年更無望。此等小天地，豈容我輩飛躍哉！」(註四十一)中國令連橫樂觀到「到處可居」，台灣則令他悲觀到「居之甚厭」。年老有此心態，其情可憐可憫；「台灣」已失去了雅堂先生對它的信心，「中國」則「現雖積弱，外侮內患，一時未寧，然以歷史因果而論，必能轉弱而強，如戰國後之有漢，六朝後之有唐，唯在國人之奮發，而我輩為引導者。」(註四十二)

連橫之「中國情」生前還作了兩件事後印證的預測：

(1) 雅堂先生去世後兩代獨子，「必能大發達」。連震東及連戰，官至內政部長及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橫有先見之明。

(2) 告震東曰：「欲求台灣之解放，須先建設祖

國。」並預言中日必有一戰，乃先妥爲其孫名爲「戰」。二次大戰果真是中日決戰，但戰後台灣是否「解放」，則應由公正的史家來評斷。

2. 連橫本人也擬在國民政府中謀職，希望能入清史館工作，撰述台灣通史續篇，記載乙未以來三十餘年之事。「昭示國人，籍資殷鑒。……歸國之後，倘得一安硯之地，從事修纂，必有可觀。」

(註四十三)「如得追隨大雅，供職蘭台，博采周詢，甄別善惡」；希望張繼能「大力爲之吹噓，區區寸心，效忠宗國」。(註四十四)

連橫忠心耿耿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後代子孫又是政權朝貴，位居要津，不似他本人應科試不第。要是其後裔也如同他被拒於官場，且又親自目睹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來台後對「台灣人」之慘酷殺戮，連橫之「中國情」是否會熄滅而重燃他的「台灣心」，則不可得而知。連橫死後，他的後代在台灣享受榮華富貴，與他的同輩之繼承者相比，後者皆相形失色。雅堂先生地下有知，也當含笑了。1931年，國史館館長黃季陸提及連橫致張繼之信，應爲國人一讀，尤其是「台灣人」。(註四十五)1973年，更建議教育部長蔣彥士將之列爲中學國文教材。1977年台灣大學選《台灣通史》廿一篇爲該校「大學國文」之材料。(註四十六)非拜「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句話之賜，連橫之光環不會那麼明亮燦爛！

3. 雅堂先生雖生於亂世，但終是命大，當「日」「中」兩國在台殺戮有風骨的台灣人時，一次適逢丁憂，一次則已告別人世。台灣在戰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戒嚴令無所不在的淫威裡，連橫之子孫早在國民黨的庇蔭之下，非但安然無恙，且步步高昇。否則光以他的藏書中有「德文馬克斯研究二冊」(註四十七)，就足以身陷囹圄，或遭無妄之災。蔣家父子統治時的台灣，在思想上控制言論，扼殺出版，以「三民主義」作爲「思想善導」工具，國民黨死敵所奉守的共產主義祖師馬克斯，被斥爲洪水猛獸。黨化教育與「皇民化」教育如出一轍，且變本加厲，「台灣」形同「埋怨」之地，風聲鶴唳；其陰毒、

恐怖、淒慘之情，絕非連橫所能想像。台灣人研讀《台灣通史》，雖深信「今天我們不是生於斯，便是長於斯，人人都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註四十八)但此句連橫說出來很中中國人聽的話，卻不是「思想自由」的護身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盧修一先生。修一在文化大學撰述碩士論文時，以《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爲題，文中毫無異議的採納並發揮連橫的大中國情懷，部份還引申得極爲過份：「台灣雖暫時爲日本所佔，然台灣乃中國之台灣，台灣人乃中國之人，本質上永遠不能改變。」又說：「台灣乃是中國人所開拓的海外新土，也是中國文化延伸傳播的區域。基於血緣與文化的雙重關係，台灣與大陸絕對不能分開。」(註四十九)但盧修一終因以後思想「左傾」而受感化教育，從而告別大中國主義，而投入台灣獨立建國行列。連橫生前有言：「若以台灣今日之思想而觀，則其所表現而要求者，平等也、自由也、幸福也；此等之外，尚有何種之思想？亦何庸爲之善導乎？」(註五十)國民黨重施焚書坑儒劣技，以一言堂之暴政爲尚，如此代表「中國」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不知連橫先生是否還樂意予以支持？

以歷史研究爲要旨的雅堂先生，難道不知「台灣人」辛酸悲痛的過去。昔荷西統治時，「余，台灣人，亦荷西人也！」明鄭領台時，「余，台灣人，亦中國人也」；日本殖民台灣時，「余，台灣人，亦日本人也」，國民黨的中國人來時，只說出「余，台灣人也！」都得噤若寒蟬，僅能從小在教科書內背誦「我們都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誰敢公然宣稱「余！台灣人也」，可能就會有牢獄之災或殺身之禍。台灣人是否能有一天，只要道出「余！台灣人也」即可；猶如日本人說：「余！日本人也」一般，而非「台灣……永爲中國人的領土，台灣永爲中國人的台灣。」(註五十一)

人的思想觀念要超越地域界及時間界，頗不容易。柏拉圖的洞穴比喻，培根的洞穴偶像，都是思

想家應該警惕的。界域有高下寬窄，越能不受眼前之迷霧所惑，就越能高瞻遠矚，為萬代後人景仰欽佩。基於人權的尊重及自由意志的發揚，加上認同鄉土之基本人性光輝，台灣人如有機會選擇走自己的路，何妨也鼓勵或准許台灣人光明正大的說「余！台灣人也」即可；至於其他人作如何判斷，站在民主的精神而言，也悉聽尊便。不過，雅堂先生當知如加拿大傳教士馬偕在台灣的行徑，馬偕自承是台灣人；「余，台灣人也」就沒再有續語。一個外國人都能心安理得的道出作為台灣人的決定，有台灣歷史責任感的連橫，為何還要硬加上「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這句贅詞呢，難道這也是一種「思想善導」？需知莊子有言，井蛙不可以語海；否則「必為雅棠笑矣！」

四、最具台灣認同的，莫過於連橫對台灣語之研究及台灣鄉土文學之贊揚，連氏也以此自豪。林茂生博士對他說，《台灣語典》可與英國某氏之英語典相伯仲。而雅堂也說：「余亦自信為傑作也。」

（註五十二）

1. 台灣具有發展台灣特色的鄉土文學條件。連橫說，「夫以台灣山川之美麗，風景之清幽，自然之變化，千奇百態，蘊蓄無窮，必有大藝術家者出，以揚海國之雄風。而今日尚無有起而作之者，則社會不以為重，獨唱寡和，聞乎無聞。」（註五十三）台灣的天然環境，「美麗島」之雅號，正是作詩吟詞的最佳場所。加上台灣歷史人文之悲壯事跡，更是文學家創作小說的題材，也是音樂家作曲彈奏的最好靈感。即使如「台北之採茶歌，純粹之民謠也，又莫不有韻，且極抑揚完轉之妙。余嘗采其辭，明其意，美刺怨慕，可入風詩。」（註五十四）雅堂先生一生作詩，以杜甫為尚。他的詩境，取之於「台灣之山川奇景，氣象雄偉」，又兼具風骨氣節，已足具「詩豪」資格，「以與中原爭長。」（註五十五）連橫所著台灣通史，宗師司馬遷。書成，友人林朝崧贈詩：

願君好繼龍門史 藏向名山後代看（註五十六）

通史卷末，豪氣千雲的道出：

三百年來無此作 拼將心血付三台  
從此不揮閒翰墨 青山青史尚青年  
絕業名山幸已成 網羅文獻責非輕

司馬遷馳騁於中國史學界，連橫也稱雄於台灣史學界；二者各領風騷，東西輝映，彼此爭光。

勿小看鄉土，這是鄉土文學且認同本土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自我作賤，最不能原諒。矮化台灣，更應受指責。台灣的主觀及客觀條件，提供如此優厚的文學創作內容，台灣人竟然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卻一味的以中原為高，以「祖國」為傲，或以歐美為榮，這才是台灣人數典忘祖的明證，不足為訓。

2. 以台語當台灣的國語：荷西治台時，強迫台灣人說荷西語言；日據時代，國語運動，國語家庭，國語學校，雷厲風行，台灣人不得被迫以日語當國語。國民政府佔領台灣時，原住民被逼改漢姓，取漢名，全台也大力推動「說國語」，台灣人不得不說起頗不適合於台灣人發音的北京官話。連雅堂以他對語言歷史學的精深研究，指出台語之特色與優點，絕非其他語言可望其項背。不只「台灣語之組織，自有文法，名詞、動詞、介詞、助詞，亦有規律。」（註五十七）且「台語並非方言，乃是古代的中原標準國語，五胡亂華時，中原士大夫避地閩南，遂衍稱為閩南語，明末清初……又衍稱為台語。」「台灣之語，高尚優雅，非庸俗所能知。」但不幸，台灣人妄自菲薄，「今之搢紳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遊官府，附勢趨權，趾高氣揚，自命時彥；而交際之間，已不屑復語台語矣！」（註五十八）

此種痛罵，實在大快我心。連氏之不滿與憤怒，不幸卻存在於他所說的「台灣人」身上。還有人恬不知恥的說忘記「母語」本屬應該。試問敝帶是否也應自珍，何況台語又非敵；不惜自家寶，這是自作孽了。底下這段引語，相當傳神的展演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

顏之推氏有言：今時子弟，但能操鮮卑語彈琵琶以事貴人，無憂富貴。噫！何其言之惋而戚耶！今時子弟能操東語，唱和歌，而不能富貴，幸而得事貴人，不為屬吏下士。一朝待志，趾高氣揚，則不屑操台語，若自忘其為台人矣！霧峰富人子留學東京數年，不能操台語。或告之曰：汝他日歸家，將何以與汝父談話。曰，吾倩一通譯可耳。（註五十九）

連橫這段話，意有專指；其實他所嘲笑與斥責的，不就是當前台灣的政治界、教育界、及學術界嗎！尤其他的子孫，是否也列為他所灰心洩氣的對象，只有自家人知道了。若是心理作祟，或縮於淫威之下，則有賴連橫之啓蒙，更有待於仿雅堂之勇氣了。

連橫著述，每有自責之處。但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他在兩方面自我期許，自我勉勵，也知自己之非。其一是「台灣人，應知台灣史」，因此他作《台灣通史》。其二是「台灣人，應會說台灣話」，所以他發奮寫《台灣語典》，以平心中之不安。「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歷史，這是祖宗遺命」；但：

余台灣人也，能操台灣之語而不能書台語之字，且不能明台語之義，余深自愧。今之學童，七歲受書，天真未漓，咿唔初誦，而鄉校已禁台語矣！……余以僇民，躬逢此阨，既見台語之日漸消滅，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以謀發達，遂成台語考釋，亦稍以盡厥職矣！（註六十）

連橫痛心於台灣人民從小就未能說台語，當時日本政府嚴厲處分說台語的學生；但他是否知悉國民政府在台灣更阻礙了台語的生機，不只台灣人沒有說台語的機會，且瞧不起說台語的人；台灣學生

在學校內因說台語而惹起的風波與事件，試問雅堂先生是否還願意投效如此霸道無人性的政權。而他的子孫，位居廟堂之上，當蔣家政權大肆消滅台語之際，有無愧對祖先之憾，還是違反先人遺命，助紂為虐，為苛政吹風煽火！

五、連橫先生在史上的定位，史家評論的很多，由於他的後人是當朝紅人，因此學術界或也難免避鋒而褒多貶少，甚至只揚善隱惡。難得一見的是楊雲萍的意見，他認為已無「表彰」雅堂先生的必要，因為表彰連橫的立言貢獻，已然超出作為一個史家應享的範圍，而應該冷靜與理性的來批評與糾正了。（註六十一）平心而論，雅堂先生自幼承家教，又博學多聞，天資聰穎，結交義友，是自學成功的顯例，與胡適及英儒小米爾(John Stuart Mill)可以比美，也夠資格作為「知識份子」(intelligentsia)之林。他一方面有冷靜的腦來充實學識，分析事理；一方面又有火熱的心，來關懷台灣，尤其擔心台灣歷史、台灣語言、台灣文學之消失。這種不自私且懷有正義感的表現，十足的道出連橫一生的志向。看他的通史，為台灣人的反抗精神平反；設想他能享高壽，目及台灣二二八、四六、美麗島、台大哲學系等慘案，相信他也會挺身而出：

同胞哀嗷嗷 袖手任沒溺  
旁觀實足恥 敗群失公德  
人生處世間 白駒急過隙（註六十二）

看他在維新與保守之爭上，他也不模稜兩可的直陳己見：

我輩頭顱原不惜 其磨熱刀事維新（註六十三）

一付慷慨就義模樣，真令人肅然起敬。而為台灣彰化起義事件，更說：「吾望八卦山上，猶見短衣匹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烏乎壯矣！」這種史斷，也足為台灣人之表率。

## 結語

在著述方面，連橫挑了最困難的任務為其一生之職責，一是撰述台灣通史，二是研究台灣語典；這兩項艱巨工程，為台灣學術界作筆路藍縷的啓發工作。雅堂先生死後，政府只表彰他的大中國情懷，卻在學校教科書內，輕蔑台灣歷史，台灣語言，台灣文學等教育工作。雖經後人之努力來平反，卻也無法告慰先生在天之靈。而誰是罪魁禍首，以雅堂之聰慧，也理當一目瞭然。「台灣」這個稱號，素為連橫有志於研究的對象。「台灣之名，始於何自？或曰岱員，或曰埋冤。由前之說，是為仙境；由後之說，是為鬼窟。我輩生斯、長斯，聚族於斯，何去何從，在於自釋。」（註六十四）讀連橫書至此，能不感慨萬千！台灣「埋冤」久矣，孤魂野鬼、冤枉而屈死者，數以萬計，哭調的老歌瀰漫在台灣這片鄉土。吾人期望台灣有安魂曲，使「生斯、長斯、又聚族於斯」者皆能共享平安夜，讓《通史》所載之不公不義消失，悅耳溫雅的台語為各族群所樂講，尊重並禮遇原住民，發揚母語，使「台灣」變成仙境的「岱員」而非鬼窟的「埋冤」。此外，台灣現時的政治語言，以前是最敏感但目前是最熱門的話題，莫如「統」「獨」紛爭。連橫的「余，台灣人也」，看在「獨」派的心目中是眼睛一亮，但「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則令「統」派的人振振有詞引為知己。白色恐怖時代，「台灣」之名是個「禁忌」，「台灣」何辜！雅堂先生的鄉土認同至少在文化上一歷史、詩、及語言——他認同台灣。而國家的認同，應建基於文化的認同上。今日台灣國家定位問題，如能在紀念雅堂先生的同時，大家共同努力來研讀他的《台灣通史》《台灣語典》及《劍花詩集》，或許也可以在這個爭論不休的政治論題上找到一些答案。

綜觀連橫先生之一生，在認同「國家」或「鄉土」意識上之變化，實在是研究他個人人格心理或

探討該段歷史中甚具價值的思考對象。雅堂作為一個「台灣」人，認同了「台灣」，似乎在時間的先後上一致，不生矛盾。但在「國家」的認同上，到底他認同台灣還是中國，則可能爭議甚多。不過，比較可以確定的是，早期他之以「台灣」人為榮，此信念極為堅定，但在日本「國」之統治下，他雖不敢公然於行動中對於作為日本「國民」表示不滿，卻在內心裡存著「大清帝國」臣民之想法，這是當時一般讀書人通有的「共識」。因為他至少沒有在「余，台灣人也」之後又補上「余，日本國人也」一句。到了中華民國成立時，當時台灣在國際條約之下，仍屬日本「國」的一個屬地，並不在「中華民國」的領域之中，他立即有了認同台灣之餘，更加認同了「中國」，且甚至以作為「台灣」人為恥。這種轉折，實堪玩味。除了他當時的處境，因為吸鴉片問題而廣招台灣人之圍剿及辱罵，而內心起情緒上的反感作用之外，可能也中了傳統士大夫或儒家思想之影響。個中詳細實情，可能有必要另作一長文仔細深究。本文之作，也謹在此把該項重大問題拋出來，因為就筆者所知，此問題似乎還未有學界中人提出來探討。拙文也只就所知之史料，作一些具體之推論，容或有謬誤之處，還請方家不吝指正！

### 註釋

註一：連橫，*臺灣通史*〈諸老列傳〉，卷二十九之結語。

註二：連橫，*臺灣通史*〈經營紀〉，卷三。

註三：朱夢瓊，「從臺灣通史看連雅堂的民族意識」，*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2,22。

註四：連橫，*雅言*第二十六則。

註五：同上。

註六：同上，*雅言*第一六六則。*臺灣語典*，*雅言*，臺灣省文獻會，1992,77。

註七：曾迺碩，「連橫的生平思想與事業」，*連雅堂先生相*

關論著選輯（下），同註三，94。

註八：連橫，寧南詩草，鄭喜夫編，連雅堂先生年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176。

註九：同上，28。

註十：同上，35。考題為：「漢唐開國用人論，勾踐焦思嘗膽論，子貢使外國論。」

註十一：連橫，臺灣通史序，臺灣省文獻會，1992。

註十二：連橫，臺灣語典，雅言，臺灣省文獻會，1992序（二），3。

註十三：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臺灣省文獻會，1992，文集卷二，臺灣誌社記。連氏20歲時，不願改日籍，乃赴上海，但因母命婚姻，乃回台成親。曾迺碩，同註7，92。

註十四：如鄭氏時代的文化，登於昭和六年（1931）。見雅堂先生集外集。臺灣省文獻會，1992，213-226。

註十五：長女夏甸於1912年讀艋舺之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1919年連震東先生於台南第二公學校畢，旋入慶應大學普通部。1933年三女畢業於淡水高等女校。見「年譜」，同註8，59,91,98,175。連震東說：「先父的日文很好」。見連震東，「先父生平事跡略述」，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下），同註3，39。

註十六：年譜，同註8，97-98。

註十七：連震東，同註15，39。

註十八：同註3，105。

註十九：俱見臺灣通史序。

註二十：林文月「愛國保種為己任的連雅堂」，見論著選輯（下）同註3，173。

註二十一：同上註，176。黃得時，「研究歷史，振興文學，考據語源—連雅堂先生對臺灣文化三大貢獻」，同上註，69。

註二十二：連橫閩海紀要序。連雅堂先生文集卷一。

註二十三：同註3，175。

註二十四：雅堂，「思想解放論」、「思想自由論」、「何謂思想善導」等，發表於臺灣民報235～244等號，是雅堂先生擲地有聲的學術自由言論，放在今日言之，仍是金玉良言。時為昭和四年（1929年）。見雅堂先生集外集。68-80。

註二十五：同上，168。

註二十六：臺灣通史，卷上，25。

註二十七：連震東「先父生平事跡略述」，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下）。同註3，36。

註二十八：方豪「連氏「臺灣通史」新探」，同註3，16。

註二十九：通史，卷19，郵傳志序，卷27，農業志序，卷28，虞衡志序。

註三十：盧嘉興「臺灣的偉大史學家連雅堂」，選輯（下），同註3，2。

註三十一：年譜，154。

註三十二：選輯（下），32。

註三十三：「取消國民黨議員之命令，其副署者所謂第一流內閣，而梁啟超又為司法院長者也。啟超雅負時望，以法治國自期許，乃見此破壞約法之命令，欣然從之，則其所自期許者何在？夫憲政之國，立法、司法並行不悖。今乃為行政所破壞，則法之精神亡矣！精神既亡，則民何託？故為司法總長者，而稍有人心，拒之可也；爭之可也；則不能而去之可也。而啟超乃任其蹂躪，其能免於春秋之責乎？」年譜，75。

註三十四：同上，78。

註三十五：連橫致國民黨黨國大老張繼（溥泉）之書。同註3，57。

註三十六：同註3，198。

註三十七：雅堂文集，卷二。

註三十八：選輯（下），57。

註三十九：連雅堂先生家書，臺灣省文獻會，1992，03。該信日期為民國21年1月11日。

註四十：同上，2, 3, 26, 38, 61, 63。發信日各為民國20年5月26日，6月13日，民國21年2月2日，7月26日，12月14日及民國22年1月8日。連震東不宜之官為教育官。

註四十一：同上，21,30,31,40。發信日各為民國20年11月25日，民國21年1月11日，3月26日，4月5日，7月29日。

註四十二：同上，62, 92。發信日為民國21年12月22日，民國22年9月6日。

註四十三：連戰「祖父與我」，選輯（下）3，83。

註四十四：雅堂文集，126～128。

註四十五：年譜，166。

註四十六：黃得時，同前註，74。

註四十七：家書，38，發信日為民國21年7月26日。

註四十八：林銀森「臺灣通史序有關史事研究」，選輯（下），155。

註四十九：盧修一，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選輯（上），127。

註五十：年譜，144～145。

註五十一：同上，180。

註五十二：家書，23，發信日為民國21年1月11日。

註五十三：文集，296「夫以臺灣山川之奇秀，波濤之澎湃，飛潛動植之變化，固天然之詩境也。」

註五十四：同上，289。「台北之采茶歌，擷翠揚芬，咸均頑艷，誠浪漫之文學也。……黨山樵唱，消夏小唱，頗有佳構。今之提倡鄉土文學者，何不起而蒐羅以存妙製，為藝苑中放一異彩也。」年譜，129。

註五十五：同上，286。

註五十六：年譜，34，龍門是司馬遷出身地。

註五十七：雅言，45則。

註五十八：臺語考釋，序一，選輯（下），24。

註五十九：臺灣語典，雅言，128。

註六十：臺語考釋，序一，文集卷一。

註六十一：選輯（下）31，楊氏甚至揶揄的說，用雅堂名義辦活動，較易申請到經費，真是諷刺。130。

註六十二：劍花室外集之一。

註六十三：寧南詩自序。

註六十四：雅言293則，125。

收稿日期：86年5月29日

修正日期：86年10月9日

接受日期：86年10月9日

# "I am a Taiwanese" —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Mr. Ya-Tan, Lian

Yu-Tee Lin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Mr. Lian was a characteristic scholar especially manifests himself at the aspect of Taiwanese identification during his lifetime in the Chin Dynasty,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K.M.T.'s control over Taiwan. Two things he struggled &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he one was to study & apprehe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d to understand the Taiwan native language was the other. All the works he wrote, these two areas were remarkable historically. Judging from his current environment,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Mr. Lian's identification of Taiwanese was vague & ambiguous to a certain degree. While he argued very much he was neither a subject of the Chin Dynasty nor a surrender of alien country (Japan), he emphasized and repeated to took the saying "I, am a Taiwanese" as a proud maxim and warned his younger generation to follow it, but he embarrassed to attend and failed the civil examination held by the Chin Dynasty, in addition, his command of Japanese language was quite excellent. After the defeat of Japan in 1945, no sooner than K.M.T. took over Taiwan, Lian quickly changed his insisted identification, he substituted "I, am a Taiwanese, and also a Chinese" for "I, am a Taiwanese", the former was approved and appraised by the K.M.T.'s government. And his immediate son and grandson have occupied the va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politics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alternation. This topic deals with the complicated issue of Lian's identification of Taiwanese, many historical documents, information, correspondences, diaries, whatever material relevant to it appears in this paper. Criticism and judgment accompany it also.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civil examination    History of Taiwan    Language of Taiwan